

2017年,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是1978年的3倍,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是1978年的7倍

四十年的就业变迁

本报记者 赵 昂

1978年,全国4.01亿就业人口中,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仅有6945万人,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4890万人,到2017年,全国7.76亿就业人口中,第二产业就业2.18亿人,第三产业就业3.48亿人。1978年,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,2017年,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4318元。

从1978年到2018年,40年的时间里,就业数据变化的背后,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。

1978年 顶班与高考

1978年,高中毕业的张忠年有两个选择,进工厂顶班或者高考,顶班十拿九稳,高考命悬一线。当时,在企业单位,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空下来的名额,到父母单位上班,是一种招工方式,不少父母甚至会为了子女及时顶班吃上“公家饭”,选择自己提前退休。

“顶班马上就是学徒工,拿工资,如果不顶班参加高考,落榜了,虽然街道也能安排就业,但肯定进不去国营的大工厂了。”张忠年说,尽管自己是应届生,但那年依然有不少往届生参加高考,当年,全国610万人参加高考,原本的招生计划,只有不到30万人。班里不少同学选择了顶班,原因很简单,即便是学徒工的二三十元工资,对于刚毕业的小年轻来说,吃住在家里,凭空每月多出来二三十元,也不亚于一笔巨款。

张忠年的考分并不低,但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上榜,有幸的是,那年许多大学开始办分校,在全国范围内,招生名额增加了近11万个,他得以入学。毕业后,分配到了一所学校当老师,他把顶班进厂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哥哥,身为知青的哥哥得以顺利回城,当然也放弃了高考,“厂里说,只能解决一个人。”

但是,兄弟俩后来的人生却迥异,张忠年大学毕业当了老师,学校没有房子,很多年他只能和父母挤在一起,哥哥进了工厂,不久就分了房子搬出去住,相亲时也加分不少。不过,张忠年的哥哥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末,失去了这份工厂工作,尽管在中学时代,他的成绩并不比弟弟差。

有的时候张忠年总在想,如果兄弟俩换一种选择会是什么样?“一边是铁饭碗,一边是大学,只能选

1988年 星期天工程师

“为什么周末去集体工厂打工,因为我的孩子想看《猫和老鼠》,彩色的。”如今已经退休的郭先生,还记得1988年自己当“星期天工程师”的岁月。当时在一家国营印刷厂当工程师的他,每月工资100多元,但商场里一个小汽车玩具就要5元,儿子总想要新的玩具。

不得已,他选择多上夜班,每多上一个夜班,能多一元五角钱的夜班补贴,上三次买个玩具。“生了儿子后,各种花销都很大,奶粉钱、尿布钱……”郭先生意识到,铁饭碗虽然能吃吃饭,但不能光靠死工资。

1988年1月,《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发布,允许科技干部兼职,同年,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。上世纪80年代乡镇工厂处于起步期,缺少技术人才,不少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业人才,开始在周末到乡镇企业兼职。

“乡镇工厂在远郊区,早上5点钟坐班车,一路晃晃悠悠到工厂也快8点了。”工厂周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,乡道旁是冲天的大树。

兼职的收入甚至比单位的工资还高出不少,郭先生如愿买了奶粉,玩具,他还花了2000元,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,“取钱的时候让两个同学陪着一起去,怕被抢。”后来,他又攒了钱买了录像机,到处去借录像带,“从那个时候开始,儿子跟着录像带学英语。”

2017年,郭先生在大洋彼岸去看了迪士尼乐园,儿子陪着他,儿子现在也是工程师了。

1998年 为能洗澡而下海

1998年3月,当听到电视新闻里说,“某某部被撤销”时,当时在某部属企业工作的王俊,发现电视周围围观的同事都沉默了。“都都没了,企业移交给地方后,大家怎么办谁也不知道,每个人都要打算盘,是走是留,走,去哪里,留,能有什么样的安置?”当年,9个工业部先是改成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局,之后这些国家局在2000年底撤销。

1998年对于王俊来说,还意味着另一个坎——房

子,在企业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上,尽管他参加工作也有十几年了,但依然没有搭上末班车,和妻子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,没有暖气,也没有卫生间。“平房区水压低,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,而且洗澡就在临时搭建的小厨房里,冬天外面多少度,里面就多少度。”

王俊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,医院规定下夜班可以洗澡,但王俊的女儿如何洗澡就成了问题。有时候,赶上妻子当班,王俊就带着女儿去蹭医院澡堂。“爸爸骑车带着我,骑了一个多小时,到医院找到妈妈,我才洗上热水澡,还得偷偷摸摸不能让科主任看见。”王俊的女儿还记得,回家的路上父亲也要骑一个多小时,洗完澡的她喜欢一路唱歌,但父亲一路沉默。

“我一定让你们娘俩住上有卫生间的房子。”王俊曾经对妻子这样说,1999年,他辞职下海,学工业建筑的他,与别人合伙开装修公司,小工不够时自己也要上阵。有一次去工地上送吃的,看着大学毕业的老公一身水泥点子,王俊的妻子一路哭着回家了。

2003年,王俊买到了房子,北京北四环旁边的楼房,每平方米5000多元,买房花去了夫妻俩全部的积蓄,还借了不少钱,以至于在之后的两年里,夏天没有空调。“还好这次赶上了末班车,过了2005年,房价就一路飞涨了。”

现在,他们还住在那时候买来的房子里,不过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房子,还有一套,留给女儿结婚用。

2008年 “正经工作”是什么

在考公务员这个问题上,2008年大学毕业的彭先生,一直能感受到父亲的压力,也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希望他考上公务员。“父亲毕业时有两个选择,去机关还是去企业,结果他选择去企业,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去机关的同学少了不少。”

从此,彭先生的父亲就认定了一个死理:只有考上公务员,最终考上个事业编才算“正经工作”,其它工作“都是临时的”。不过,在2008年时,国考尚未如后来般火热,彭先生在学校的双选会上甚至发现,机关事业类单位招聘时,反而投简历的人不如去银行的多。“那时候公务员工资低,吸引力也不高。”

于是,彭先生并没有怎么复习,“裸考上阵”败北了,连面试都没进去,后来去了一家外企工作,收入并不低。“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对我说,你一定会后



“玩具之都”转型升级

12月12日,在汕头市澄海区,工人在一家玩具企业生产线上进行玩具组装加工。

近年来,被誉为“中国玩具之都”的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从简单的玩具加工产业向创意产业、文化产业等高端产业转型升级。

新华社记者 张加扬 摄

本报记者 张 翀

本报通讯员 程莞茹 郑 茜

12月7日,深圳,阳光正好。

在全球最大会展中心——深圳国际会展中心,9对夫妻穿着婚纱礼服重温爱的誓言,爬上脸庞的皱纹、满头华发是他们数十载风雨同舟婚姻生活的见证。

他们是最平凡不过的夫妻,也是中建三局二公司首批投身深圳建设的建设者。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正式成立,1983年公司指派首批建设者从湖北赴深圳,投身特区建设。

他们是亲历者,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心路历程,也为此奉献了一生。这隆重的仪式,是对建设者迟到的祝福。

杨太祥、张德桂夫妻

唯有鸿雁传书

杨太祥1934年出生,毕业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施工管理专业,毕业后的时光几乎都伴随着国家建设。

时光回溯到1983年12月30日,杨太祥记得清楚,那一天武汉飞雪,很多人正在准备迎接元旦和即将到来的新年,他却背上了行囊南下,目的地是百度俱兴的特区深圳。

“我们开着两辆货车一辆吉普车,从武汉一路南下,到广东省乳源县山区时正值深夜,又遇大雪,车辆无法前行。”一伙人只能在当地的县委招待所搭床铺,将就了一晚,就是在那里,他听到了新年的钟声。

他们在深圳承建的第一个项目是罗湖口岸的联检大楼,156天,新大楼竣工。这也是我国最早实行

联检的口岸,它联结着深圳和香港,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陆路出入境口岸,而这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。没有宿舍,所有工作人员只能在河边搭建毛毡房,忍受蚊虫的叮咬;没有上下班,第一梯队、第二梯队24小时连运转。那一年过年,几乎没有人回家。

“他走时,我就知道过年是不可能一家团圆了。”妻子张德桂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圳过年,因为工作忙,34岁“高龄”时,杨太祥才与同科室的张德桂喜结良缘。杨太祥是负责测量的技术能手。

自此之后,杨老在深圳陆续参与了多个重要项目的建设,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发展;而在武汉的家,张德桂也十分忙碌,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,还奔波于各个工地上。在通讯都不便的年代,两个人唯有鸿雁传书。

彼时工作之余,他们也会思乡,“那时深圳还很荒凉,深圳河只是一条臭水沟。”他们也会羡慕河对岸的香港有电视有冰箱,“根本没有想到,两三年后,深圳就到处都有电视冰箱卖了。”各种票据最早也是从深圳开始消失。“我们觉得自豪,也决定定居在这个城市。”

陈宝根、郑世诗夫妻

缺席的丈夫与父亲

1989年,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——深圳证

悔的。”果不其然,到了2009年,国考人数开始上升,报名人数突破百万人大关,竞争比达到了57:1,彭先生一度有些懊悔。

不过后来,彭先生也渐渐发现,父亲所说的“正经工作”,其实更像一个围城。“我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,发现每次大家聚餐,都会把几个在机关工作的同学放在首座上,大家不外乎抱着一个心态,迟早有事能求到他们。但私下和他们聊天,其实待遇是透明的,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,很多事情,办事也已经规范化。”

但最终,在毕业5年以后,彭先生还是利用读研的机会,重新领了一次派遣证,选择了一家国企就业。原因并非是要装扮“正经工作”,而是在他所在的行业,国企开出的价码,已经不低于外企了。

2018年 创业不是一件容易事

“最初创业,只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习惯朝九晚五的工作,想一边赚钱一边旅游,自己当老板,时间随意安排。”从欧洲留学回国后,刘金意在今年年初,开了一家小型的音乐培训机构,主要做青少年乐器培训。数据显示,今年年内,全国创业公司总量已经超过10万家。

创业开始,他曾经想拉昔日的同学入伙,“不为了拉来投资,只是自己同学放心,不会多吃多占。”结果,所有的同学都回绝了刘金意的好意,“大家都说,自己也快30岁了,已经有份稳定工作了,不愿意辞职过来。”

于是,刘金意只能事事自己上手,“一家小公司,小到房屋水电暖气,再到邻里社区关系,大到办照上税开工资缴社保,事事都要自己操心,事事都要开支。”最终,机构经营起来,与“一边赚钱一边旅游”的初衷南辕北辙,“自从开业了,就没有晚上9点前回过家。”创业之前,他熟读诸多创业励志书籍,一度梦想着自己能把店面开成连锁的,最终融资上市,创业之后,才明白很多事情并不容易。

比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经营问题更复杂的,是面对社会上的事务,“就是门口的扫地大爷,你都不能得罪,不然你家门口总是挂个‘小心地滑’的牌子,你说顾客还上门么?”刘金意发现,创业之后才明白,社会是一个大学校,“要说创业带来的最大改变,就是性格磨平了,也磨圆了。”

新闻广角

汪雅臣:传奇“双龙”以身殉国

(上接第1版)

据不完全统计,从1933年至1940年的8年中,汪雅臣率领部队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,共击毙击伤敌军近2000人,缴获各种枪支1800余支、粮食100余石,现款9000余元,其他物资折价9万余元,解救120名劳工和9名被押爱国者。

1946年五常解放后,人们为了缅怀抗日英雄汪雅臣,将沙河子镇蛤蚧河子村命名为“双龙村”,将五常镇的南北大街改为“雅臣大街”。在他的老家蓬莱,汪雅臣的革命精神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人。“汪雅臣有勇有谋,更有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。我们要把他身上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,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。”蓬莱市党史研究室征集编研科科长董琳琳说。

(上接第1版)

1941年初,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张正坤在危急关头受命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,组织部队突围。他指挥部队人数倍于己的顽军激战七昼夜,终因寡不敌众,部队伤亡惨重,他在战斗中重伤被俘。

国民党顽军将张正坤作为“要犯”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,在狱中对他进行游说诱降、刑讯折磨和死亡威胁,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。他组织狱中被俘难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,他对难友们说:“革命是要流血的,我们要坚持斗争,决不屈向敌人屈服!”

1941年夏,张正坤组织被俘战友们越狱,为掩护难友脱险英勇牺牲,时年43岁。

以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为背景,9对首批深圳建设者夫妻,拍下了见证他们风雨同舟的照片

迟到的婚纱照

券交易所诞生。

也是这一年,陈宝根从武汉调往深圳,他见证了深圳的第二轮快速发展,也承受着一年只能见一次家人的内疚,他是建设者,但在婚姻中,他是缺席的丈夫与父亲。

1970年,陈宝根遇到了郑世诗。那时,他是中建三局二公司宣传队队员,精通笛子、萨克斯、扬琴、芦笙等乐器,而郑世诗在中建三局三公司一处上班。

“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演出上。”一个长相普通的青年男子,却是多才多艺,“自己很是倾心,心里开始慢慢了解他。”

于是两人恋爱了,1972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只是那时,郑世诗没想到,后来因为工作忙,虽然精通乐器,丈夫却很少单独跟她表演过。

婚后,两人育有一儿一女,郑世诗调入二公司,而陈宝根也调到了安装处,自此,他们聚少离多。“儿子参加高考时,他因为工作忙也没能回来。”郑世诗从未抱怨过,“很多人都是这样苦过来的。”

如今,两人的儿子也在中建三局工作,他们希望孩子能将吃苦耐劳的品质传承下去。

邓金元、高薇夫妻

一年只有两次见面

邓金元和高薇的爱情从学校开始,两人都是北

京林业大学的高材生,高薇是播音组组长,而邓金元是团支部宣传部长,

1968年邓金元和高薇一起进入公司,“那时候我们满了27岁还没结婚,因为没钱。”终于领证后,师傅给他们做了一张1.1米宽的木床,师傅做了两个小方凳送给他们。因为没钱办婚礼、摆酒席,两人就只买了两斤喜糖,当婚假休完后,两人发现身上连一元钱都没有了。

1970年至1976年,因为邓金元在公司是营部书记,要管的事情非常多。

在贵州时期,每个月仅有两三次周六下班后,邓金元打着手电筒走四公里多山路去看妻子高薇,贵州冬天很冷,但是阻隔不了相爱的人;妻子怀孕坐月子时,他都缺席了,只有在妻子生老二的时候,请了一天假回来陪她,因为高薇生产完营养休息不好,照顾孩子又特别辛苦,得了眩晕症,这成为邓金元最愧疚的事。

1986年4月,邓金元升为副总经理后被派往深圳,一年只能和妻子见两次面。

“一次是春节前后的探亲,还有一次是公司年终大会,一次时间长一点,一次短一点。”如今,邓金元回想起来,两人退休后相处的一年时间,竟然相当于退休前10年加在一起的时间。

40年来,中建三局二公司在深圳累计承建工程256个,共获鲁班国优奖7项,詹天佑奖2项。

不能总让“公医兵学”支撑全社会用血需求

舒 年

四川攀枝花一名七旬老人,因突发消化道大出血而需要紧急输血,结果当地血站O型血告急,最终,家属将求救电话拨到了当地消防支队,符合条件的消防员紧急到血站献血,老人转危为安。

这则暖新闻的背后,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:并不是每个急需输血的病患,都能得到消防队员的帮助。

今年是我国《献血法》实施20周年,数据显示,2017年,全国无偿献血人次数达到1459万人次,采血量达到4956吨,较2016年分别增长4.2%和5.0%,献血率接近11‰。尽管相对于发达国家,千分之十一的献血率仍有很大差距,但相对于多年之前已经有很大提升。

但是,如果仔细分析相关数据,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会显露出来,献血人群依然单一,献血方式以团体式献血为主,“公医兵学”即公务员、医务人员、高校学生、部队官兵这几类人群成为献血主体。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,当年全国每千人献血10.5次,而在这四大类群体中,每千人献血次数分别为69.2次、52.5次、78次、55.8次,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。也就是说,极少数的一群人,支撑起了全国人民的用血需求,就像新闻中的消防队员一样,而普通民众的献血积极性和参与度,依然有待提高。

以献血率居全国之首的北京市为例,去年血液采集量129吨,地区献血率高达1.8%,但是采集量排名前10的单位,9家是高校,另一家是当地的一所大型国企,献血排名前100的团体中,有高校56家、机关38家、企业4家、医院2家。但是,并不是每一座城市,都分布着这么多高校和机关单位。

那么,普通公众为什么献血积极性不强?点开搜索引擎,可以发现许多“献血有害”的谣言帖子,这样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和行为,那么,有关方面献血宣传的力度和深度,是不是有待加强?

根据《献血法》,应当动员和组织适龄公民参加献血的机构除了“国家机关、军队”外,还有“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”,后者与普通公众的接触更多,应有更多鼓励献血的作为。

另外,对献血人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是国际惯例,在不少发达国家,献血较多的人群,可以获得诸多荣誉,其本人和家属也可以在用血方面受到照顾。我国许多地方针对献血人也有一定的奖励措施,但这些奖励措施是否能够起到激励作用,值得思考。并且,在实际操作中,一些奖励措施能否落到实处也是个未知数,比如献血者本人及家属在用血时候有一定的优先资格,但这样的优先资格能否得到切实保障,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尺度不一,落实不好,难免打击献血人的积极性。

北京市血液中心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,该市“平均每天有近2000人等待输血来维系生命,他们可能是一个外伤患者,一名孕产妇,一位晚期癌症患者,或者是一个白血病患儿”,因为无偿献血,“一台迫在眉睫的手术不再因为术前库存不足而取消,一个垂危的生命不再因为缺血而受到危及,一个苦苦等待的家庭也不再因为失去亲人而变得支离破碎……”

提高全民献血率,关键在于鼓励引导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众参与献血,但是,并不是每一家用人单位,都对献血工作持积极态度,在现实中,甚至出现了个别用人单位认为献血者“耽误工作”,无偿献血者不得不“隐姓埋名”的情况。鼓励群众献血,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精神和物质激励机制,不能总让“公医兵学”撑起全社会的用血需求。

山西右玉:绿起来了,富起来了

(上接第1版)

绿起来,一棵连着一棵栽,越来越多的绿色,孕育出无限的生机。

富起来,一任接着一任干

荒漠变绿洲并非终点,右玉以产业发展作为主攻方向,在羊肉、小杂粮、沙棘等特色产业培育优质品牌,带动脱贫增收。今年7月,右玉县顺利实现脱贫摘帽。

生态农业发展,因“绿”而焕发蓬勃活力。近年来,右玉县按照生态、高效、优质、安全、节约的发展要求,大力发展生态农业,不断推进生态化种养,加快推进特色农畜产品全产业链开发,带动农业提质增效,促进农民增收致富。右玉出产的荞麦、燕麦以及豆类等小杂粮和牛羊肉、沙棘等绿色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,年销售额近亿元。

此外,右玉县大力开发清洁能源,吸引了包括国电、中广核、大唐在内的众多风电、光电开发企业投资。目前右玉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,成为山西省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。

不断改善的自然生态环境,也为右玉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提供了“美丽”资本。2017年,山西省批准右玉成立首家省级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。当年全县旅游总人数达215万人次,同比增长27%,实现旅游收入20.89亿元,同比增长25%。如今的右玉,一项项旅游项目吸引着游客的目光,生态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一任连着一任干,鼓起老百姓的钱袋子,摘掉了贫困县的“穷帽子”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今天的右玉县,在绿水青山之间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。